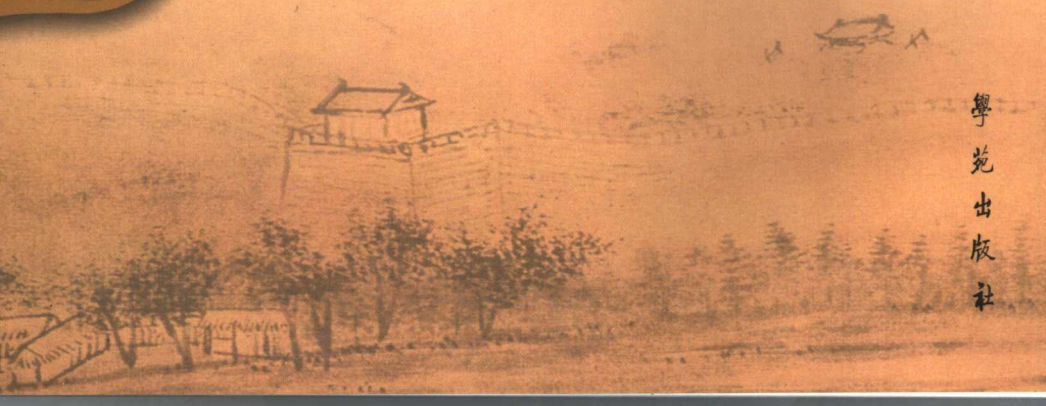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唐诗文新变

吴相洲 著



學苑出版社

中唐诗文新变

吴相洲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诗文新变/吴相洲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77 - 2818 - 7

I. 中… II. 吴…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中国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1852 号

责任编辑:刘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 × 1240 1/32

印 张:10.625

版 次: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 册

定 价:25.00 元

序

葛晓音

前些年,或许是因国内学术界重视宏观研究的缘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博士生以初盛唐或中晚唐文学的发展为论文选题,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思路。这种分段论法在80年代前期是比较新鲜的,后来一届接一届做下去,便只能在反复总结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加发挥,结果是间有小突破而不易有大创获。吴相洲君的论文选题依然顺此定势。此时中唐诗文的研究已全面铺开,有了长足的进展。要想超越前人,难度就更大。于是,摆在相洲君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人所共见的材料和习惯性的研究框架之中,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他的聪明,在于没有像以往选择同类题目的论文作者那样,将当前已有研究成果归纳、整理、分门别类,然后面面俱到地阐述文学发展的特征和原因。因为这样做必然只能产生综述性的文章。即使有所创新,也被淹没在他人的成果中,几乎看不出自己的面目了。他只是选择了自己体会较深的几个切入点,从士人的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构思方式这几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诗风演变的原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诚然,这些视角也许并不新鲜,但相洲君的长处是能凭着一种敏锐的感悟,将人们常常论及的问题归纳到某一个新的透视点上。例如关于盛唐文人希

望“为君辅弼”的大志,在论述盛唐诗的著作中已谈得很多。相洲君把盛唐文人在这方面的种种表现总结为以帝王师自居的行为风范,确切而又新颖。在找到这个透视点以后,再分析这种行为风范在安史之乱后消失的原因,便抓住了士风演变的主线,犹如提纲挈领,免去了许多枝蔓。又如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的差别,也是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论著各抒己见,精彩纷呈,似乎很少有空白遗留。相洲君注意到这两派士人在人生态度上一求凡俗、一求入圣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并着重论述了从萧颖士、元结到韩愈一派士人以圣人自许,树立名节,在矫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点,也是颇见悟性的创获。

当然,论文中也有些观点并非相洲君之新创,但因作了集中而系统的研究,所论也就较前人更为深入细致。例如“兴会”作为盛唐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虽然也常被学者提及,但因为这是一个处于创作和批评的夹缝中的问题,只有从作品出发上升到理论,才有可能谈透,所以近年来少见这方面的力作。相洲君从创作的构思方式着眼,着力探讨了从南朝到盛唐,诗人对“兴会”的认识趋于自觉的过程,以及“兴会”从盛唐到中唐的变化;并由此种变化联系到中唐另一个重要的创作理论问题,指出韩孟诗派强调“思”和“意”的作用,是导致其诗歌风貌与强调“兴会”的盛唐诗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也很有见地。此外,研究初盛唐人的风雅观,虽是我较早提出的课题,但我对中唐风雅观的演变,只是大致勾勒了一个轮廓。相洲君则对中唐前期不同的风雅观作了细致的梳理,分阶段描绘出风雅观逐渐演变的过程,切实中肯地分析了元白的“格力”、“骨格”说,以及元白、韩孟对

哀怨文学的肯定,从而进一步充实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吴相洲君之所以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和突破,最根本的原因是从研读原始资料入手,而不是从归纳前人成果出发。本文中较大的创获是论述中唐古文运动与儒学思潮的关系。有关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已经比较深入。但从肃宗到德宗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仍不甚清晰。吴相洲君着眼于这一时期对儒术现实意义的认识发展过程,细致分析了从肃宗冷淡儒术到代宗提倡儒术,至德宗时复兴儒术的阶段性特点、陆贽所起的作用、刘知几学派和古文家的承传关系,对于古文运动的背景作了更细入的发掘。“文以明道”的观念是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本文把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分成“从缘饰到明道”、“从礼乐到道德”这两个过程。“从礼乐到道德”这一过程我已在几篇文章中论及,而对前一个过程则未曾注意,亦未见同行论列。本文的论述使古文明道的内涵得到了更明确的阐发。由此可见,治学虽以独辟蹊径、开拓课题为上,但顺着前人思路挖掘,也会获得丰收。前提是必须立足于原始资料,善于发现前人研究遗留的空白和薄弱环节。

吴相洲君早年在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攻读硕士学位,曾随我进修一年。多年来笔耕不辍,而不满足于已有之杂著,仍思继续深造。1992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师从陈贻焮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第三年因陈先生赴美讲学,博士论文由我指导,故深知其写作之甘苦。今论文即将付梓,更喜其耕耘之有成。是为序。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影响诗风演变的诸要素分析(上)	(6)
第一节 行为风范的转变	(7)
第二节 思想性格的转变	(28)
第三节 精神境界的转变	(65)
第二章 影响诗风演变的诸要素分析(下)	(108)
第一节 审美观念的转变	(108)
第二节 构思方式的转变	(137)
第三章 诗风演变之描述	(179)
第一节 盛唐诗总体风格的界定	(179)
第二节 骨力遒劲风格的转变	(184)
第三节 兴象玲珑风格的转变	(194)
第四节 神采飘逸与平易自然风格的转变	(214)
第四章 中唐文的演变	(239)
第一节 对儒术现实意义的认识过程	(239)
第二节 儒学本身的发展与古文创作	(256)

第三节 “文以明道”创作要求的形成过程	(275)
第四节 古文运动对前代文章的取舍	(288)
结 论	(318)
参考文献	(322)
后 记	(328)
补 记	(330)

绪 论

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分界线。中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阶段,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相应地,文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后代文学的许多特点在此已露端倪。爱情传奇的大量涌现,文人词的制作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歌和散文的变化也十分显著,影响相当深远。叶燮在《唐百家诗序》中谈到中唐诗新变的意义时说:“贞元元和时,韩、柳、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断。”可见在叶燮眼中,中唐诗歌的新变是古今诗运一大转关。韩柳古文运动的出现对后代的散文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诗歌、散文两种文学样式在中唐的演变特征及其成因,前三章论诗,后一章论文。

全面地描述中唐诗文的演变过程是个很大的工程,并非十几万字的篇幅所能容纳,因而选择一个最佳角度来论述中唐诗文演变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其成因,使论者方便、观者清楚是十分重要的。衡量某一文学样式的演变有许多指标,题材、主题、表现手法、语言、体式都可作为这种指标。但如果逐项分析,面面俱到,不仅篇幅冗长,而且缺少整体感;反过来若只谈总体感觉,笼而统之,往往流于空泛。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诗歌演变

时选取了“总体风格”这一角度,因为风格是个“综合指数”,可以相对全面地反映诗歌演变的轮廓。在古代诗歌批评当中,风格也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人们谈一个时代诗歌的变化,往往是从风格的角度来谈的。同时,为了防止这种“综合指数”的描述流于空泛,对总体风格的内涵做了一个清楚的界定,指出盛唐诗的总体风格是由骨力道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个互相联系的内容组成的。描述中唐诗歌的演变就是分析这四点内容的发展变化,庶几使总体风格的描述“看得见、摸得着”。

风格是多种因素在不同层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而在分析风格变化时有必要系统地分析其成因。

首先是按系统的层次性原则分析各种因素在不同层面所起的作用。影响风格的主要因素有: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表现手法、构思方式、审美观念。而风格是通过形象显示出来的,同时又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内涵的这种多层次性决定了影响风格的诸多要素在发挥作用时也具有层次性。例如行为风范最接近构成风格的形象特征,精神境界最接近构成风格的本质特征,而思想性格则介于两个要素之间。再如表现手法、构思方式、审美观念三个要素,从形象到本质也依次分为三个层次。在这六个要素中,表现手法的分析理论价值不大,不做专门分析,重点分析其他五个要素。

其次是按照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力图找到促成总体风格某一项内容的多种原因,例如骨力道劲的特点,其成因就有如下几个方面:游侠、帝王师式的行为风范,乐观向上的性格,高尚的精神境界,崇尚风骨的审美观念。

第三,注意考察研究对象的整个发展过程,不仅考察总体风格每项内容从盛唐到中唐的发展过程,而且要考察影响总体风格的各个要素从盛唐到中唐的发展过程。系统化本身就是科学的方法,特别有助于发现被忽视的环节。例如人们只在谈盛唐诗时才讲风雅观,很少有人谈中唐诗时提到它。其实中唐人也讲究风雅的理论,只是观念与盛唐不同而已。因而考察风雅观从盛唐到中唐的整个演变过程就会发现,中唐的风雅观正是对盛唐风雅观的继承和扬弃,它的演变过程与诗歌风格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考察风雅观演变全过程的系统意识,就无法发现这一过程,许多问题就无法解释。

文章拟从“文以明道”这一创作要求的角度来论述中唐文的演变特征和成因。因为中唐文相对盛唐发生的最大变化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出现,而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是文以明道。可以说古文运动中的一切问题都是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综观韩柳古文运动的内容,不外是结合现实生活以明儒家之道,因此,本文拟从现实生活到文章创作这一角度,分四个层次来论述这一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政治生活。古文运动是与中唐儒学的复兴相伴而生的,而儒学的复兴也就是中唐人对儒术现实意义认识的提高。现实政治需要儒术,儒学随之复兴,这就是古文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二个层次是从儒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具体论述古文家们是怎样把儒学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创作的。萧李古文集团和韩柳古文集团分别隶属于盛唐和中唐两个阶段的儒学,这两个阶

段儒学的各自特点及其联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第三个层次是从文章创作的角度来考察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文章表现内容的变化。

第四个层次是从古文家们对前代文章的评价取舍中看他们如何处理“明道”和“作文”的关系。

在这四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分析了文以明道这一创作要求出现的现实原因和理论根据,后两个层次则是分析在创作时如何实现文以明道。

谈中唐诗文的演变是以盛唐为参照系的。例如诗歌,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把盛唐诗视为典范,研究以前的诗是看它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盛唐的,研究以后的诗是看它相对盛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参照系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说越接近盛唐,诗歌的艺术价值就越高。另外,限于篇幅和能力,文中只谈中唐诗文相对于盛唐的变化,对盛唐诗文特点的形成,只有个别章节做了追溯;对中唐诗文演变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基本未做论述。

中唐诗文的演变并不是直线的匀速运动,它有一个“渐变”到“大变”的过程。从理论到创作,都可分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肃宗至德(756-758)初年至德宗贞元中期;后期从贞元中期至穆宗长庆(821-824)末年。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作家群体表现出来的特点,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不宜做特别严格的限定。例如前期诗文的某些特点在天宝(742-756)时期就已经有所显现,而后期某些作家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晚唐。文中在分期的同时,又沿用前人关于中唐诗文流派的划分,如萧李古文集团、韩柳古文集团,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因为这些流派也

是按创作特点来划分的,对描绘出中唐诗文演变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中唐文学演变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结论目前看来仍是不可更改的。但科学的发现不仅表现在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还表现在对结论的推导过程当中。本文有的地方沿用了前人的结论,如对盛唐和中唐诗歌总体风格的概括,就综合了部分前人的观点,但在证明这些结论时本文都力求采用新的方法,选取新的途径。这也是文章的重点所在。

以上便是本文选题的意义、主要内容和所使用的方法的简要说明。

第一章 影响诗风演变的诸要素分析(上)

风格是作品在内容和形式的密切融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是作用于作品的内容,并由内容影响形式的三个重要因素。这一章主要考察从盛唐到中唐诗人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变化给诗风演变带来的影响。

从这三个要素来考察一个时代诗歌总体风格的变化是受到了林庚先生的启发。林先生 1958 年在考察盛唐气象时说:“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1]可见林先生是从“时代性格”、“精神面貌”两个方面来把握盛唐诗总体风格的。但林先生所说的“时代性格”、“精神面貌”和我所说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还不尽相同。首先,林先生是就整个时代而言,我是就作家而言,二者有联系也有差别。其次,林先生所说的“精神面貌”既是指盛唐时期人们外在的行为风范,又是指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我所说的精神境界则是指诗人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有联系但又不是等同的。

第一节 行为风范的转变

盛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士人的精神得到了巨大的解放,表现出和以往任何时代都不相同的行为风范。旗亭画壁、饮中八仙、吹台怀古、林泉优游,都展示着一代诗人志向远大、潇洒自由的风采。给人的印象,他们是高谈王霸大略的帝王师,超凡脱俗的游仙客,任性使气的游侠,啸傲山林的隐士。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古代英雄自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放声歌唱清明的政治,坦率抗议现实的不平,确如林庚先生所说,表现出一种“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2]。盛唐之音,即盛唐诗的雄伟壮丽、神采飘逸、明朗昂扬的风格,首先是这种行为风范在诗中的表现。

然而盛唐人这种昂扬潇洒的行为风范,自历安史之乱以来,便消失了,或被改造了。

所谓“消失了”,是指社会环境的骤然变化,游仙、游侠式的人物不见了。进入中唐以来,诗人们很少再像李白那样去游仙,真正的隐逸之士也减少了或不像以前那样出名了。《旧唐书·隐逸传》录乱前十七人,乱后仅三人。《新唐书·隐逸传》录乱前十八人,乱后仅六人。关于游侠的诗也大为减少。因为战乱使游侠们失去了横行千里、立功边塞的生活基础。韦应物《逢杨开府》一诗中就叙述了他由一个“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3]的侠少到“把笔学题诗”^[4]的过程。原因就是“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5],安史之乱一起,早年的任侠生活遂告结束。

所谓“被改造了”，主要是指盛唐士人那种帝王师式的行为风范而言。盛唐人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往往以出将入相自期，因而他们很向往张良、诸葛亮、谢安那样的帝王师式的人物风范，可以说大济苍生的理想与帝王师式的人物风范，一里一外，是盛唐诗人进取热情最突出的表现。由于这是盛唐人行行为风范的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它的转变须仔细考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时代士人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风范，固然是现实环境作用的结果，但和朝廷特别是皇帝的个性爱好尚有很大关系。《新唐书·卢照邻传》载：“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蒿山，屡聘贤士，己已废。”^[6]即从反面证明士人的行为风范与皇帝好尚的关系。可以说盛唐人那种帝王师式的行为风范是玄宗提倡的结果，而安史之乱以后这一风范被改造则与肃宗的个人爱好有关。

玄宗奉行求贤而治的治国方略。他在《春中兴庆宫酺宴序》中说：“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捍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缙绅之盛。”^[7]当时朝廷取士的科目有才膺管乐科、王伯科、将帅科、哲人奇士、逸人屠钓科、高材沉沦草泽自举科。从玄宗的《序》和制举科目中可以看出，玄宗所欣赏的就是像管仲、乐毅、伊尹、姜尚那样的帝王师，那些坐而论道、运筹帷幄、能够经邦治国的人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盛唐也确实出现了一批包括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在内的高谈王霸大略，以帝王师自许的士人。他们一方面高谈王霸大略，一方面又带有哲人奇士、隐逸屠钓那种放旷任性的特

点。且看新、旧唐书关于他们的记载：

(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8]。

(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9]。

(高)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10]。

(畅)璿廓落有口才，好谈王霸之略。居职责成属吏，齷齪无过而已^[11]。

(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12]。

张镐，博州人也。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镐为人简澹，不事中要。……善谈论，多识大体^[13]。

(贺兰进明曰)瑄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14]。

从上面材料中可以看出，盛唐确实培养出一批帝王师式的人物，他们也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玄宗和玄宗朝臣的赏识。“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15]的李白被玄宗召入宫中，备受尊敬。他在《赠钱征君少阳》中表示：“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16]